

翰不再使用「影響」(influence)一詞，認為影響意味着強勢文化對另一文化的強制推銷，而是使用採納(adoption)一詞，賦予行為者以主動性。如高居翰認為城市作坊畫家更傾向於採用來自北歐的繪畫模式，而不是意大利的直線透視法，恰是自主選擇的結果。

作者謙言《致用與怡情的圖像》一書只是重建中國繪畫史上缺失的部份，但同時亦是對中國繪畫史上佔主流地位的文人畫研究的一種反思。《致用與怡情的圖像》拓寬了中國繪畫史的研究範圍，首次對「偽作」、「蘇州片」作出學術性的研究。

將《致用與怡情的圖像》與柯律格(Craig Clunas)於1997年出版的《明代的圖像與視覺文化》(*Pictures and Visuality in Early Modern China*)相比較，會發現二者研究的時段雖不同，但二書研究的對象都是傳統藝術史不甚重視的圖像資料，《致用與怡情的圖像》主要集中在畫作之上，《明代的圖像與視覺文化》關注的範疇更為廣泛，關注的是「物品之上的圖像」，不僅包括了繪畫，也包括了版畫和其他器物之上的圖像，如漆器、陶瓷等。柯律格利用這些圖像資料，討論明代的圖像生產和圖像觀看。《致用與怡情的圖像》雖然討論的是繪畫，但在涉及繪畫原本的使用場合以及觀看等問題，二書仍有共通之處。如《致用與怡情的圖像》討論的《十二美人圖》原本是圍屏之上的繪畫。在繪畫的「歷史物質性」方面，則仍有進一步拓展的空間。

劉芝華

中山大學歷史系

***Gourmets in the Land of Famine: The Culture and Politics of Rice in Modern Canton.* By SEUNG-JOON LE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xviii, 300pp.**

作者李丞浚(Seung-joon Lee)嘗試以一個新的角度來看國民黨的歷史，也嘗試以城市社會史的角度來看近代中國的米穀貿易。作者的主要論點是國民政府提倡食用國產米，並輔以進口米稅來加重洋米米商之負擔，從而達到以國產米代替進口洋米的政策最終是失敗的。其主因是國民政府只考慮米穀的供應量，而沒有考慮國產米的品質。廣州居民一直在排斥品質在絲苗和洋米之下的蕪湖米和湖南米，國民政府希望在粵漢鐵路通車後把湖南米引進廣州

的政策，最終導致1936年出現米荒。作者強調應以政治史和文化史的角度來看近代中國的米穀貿易。

全書分為兩部份。第一部份包括第一章至第四章，論述廣州的食用米文化的建構。第一章是廣州社會和經濟背景；第二章探討廣州居民如何產生了對於不同產地的米穀的喜好；第三章通過1907年和1919年的兩次米荒，來論述即使在米穀供應不足之時，仍未能減低廣州居民對食用優質米穀的喜好；第四章展示在1923年至1927年間，廣州國民黨官員以妥協的態度來處理廣州的米穀食用與供應：他們一方面視香港為帝國主義壓逼中國的象徵，但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接受香港是廣州最重要的米穀供應來源地。作者企圖以上述四章來論述廣州居民對食用優質米穀有根深柢固的文化。

第二部份包括第五章至第九章，論述國民政府在1927年至1937年間如何努力推動食用國產米的政策。第五章論述廣州國民黨官員盲目相信西方的科學與技術，無視各項統計資料的警告，深信增加米穀供應便能解決廣州米穀不足的問題。第六章及第七章論述南京政府與廣州政府在實施洋米進口稅項的論爭。洋米進口稅項馬上引起廣州米商強烈反對，雖然廣州政府成功壓制了米商的反對聲音，但是把米商排除在推動食用國產米的政策之外，是地方官員進一步忽略地方對優質米穀的訴求，結果成為日後國產米取代洋米政策失敗的重要因素。第八章和第九章論述粵漢鐵路接通廣州，令廣州國民黨官員更深信引進湖南米可以解決廣州米穀供應不足的問題。他們推行一連串運輸和倉儲等制度，企圖把廉價的湖南米大量運進廣州，取代洋米，但是一連串的管理失誤，加上米商的杯葛，導致1936年廣州出現米荒，推動國產米消費政策以失敗告終。

此書的貢獻是以地方政治史和文化史的角度來探討近代中國米穀貿易，以嶄新的研究取向來討論關乎民生的貿易。作者展示了1920至1930年代廣州政府與米商的互動關係，也論述了米穀貿易和食用成為國家建構與推動民族主義的一個重要元素。作者的研究讓我們重新審視廣州國民政府的本質和政策的取向。此外，此書也探討了廣州居民對於品質優於蕪湖米穀的洋米的喜好，左右着當地米穀貿易的發展，也影響了地方政府的政策，作者的研究讓我們以文化史的角度，考慮城市各階層如何影響了跨地域的米穀貿易，以及地方政治的發展。

本書論述的一個主要論點，就是即使在米穀供應不足的情況下，廣州居民仍然傾向食用優質的白米。作者所引用的證據，是1907年及1919年廣東兩次米荒中，居民仍堅持食用洋米，從而證明廣州居民有很強的食用優質米的

文化和傾向。下述兩則上海《申報》的報導或可讓我們重新思考作者的論據：第一則報導刊登於1907年11月9日，題為〈粵省在湘採米之成數〉：「湘省自八月初弛禁，即有粵商來湘採米，現在經調查，合計在長沙、湘潭、南洲、安鄉、華容等處所購之米約在十萬石之譜云」。第二則報導刊登於1907年11月27日，題為〈湘米由漢口的實數〉：「湘省於八月初一日准弛米禁後至九月杪封關，計各埠米商赴湘採辦由漢轉運至廣東汕頭等處者，共有五十餘萬石」。湘米的品質在蕪湖米和洋米之下，這兩則報導指出廣州政府、民間組織和商人在增購洋米之時，也有大量購入品質較蕪湖米更差劣的湖南米，可見廣州居民並不一定堅持食用優質白米。在1919年，廣州最大米商黃顯芝在預期洋米價格並不會下降的情況下，一直鼓勵繼續購買蕪湖米以救濟廣東米荒（頁80-82）。這說明了在米荒時期，廣州居民並不抗拒食用蕪湖米和湖南米。

對食品的喜好是社會文化史的範疇，要研究其形成及如何影響人們的生活，需要從社會不同層面來探討和分析，特別是城市中不同階層的取態，這點作者顯然並沒有深入探討。城市各階層對於不同品質米穀的取捨，是基於米穀的價格、供應量、味道和質量。廣州所指的洋米包括了暹羅米、安南米和仰光米，它們的品質各有不同，價格也有差異，而即使來自同一產地的米穀，其進口銷售的種類也有不同，例如廣州進口的暹羅米有碎米、半碎和白米等不同品種，其價格有頗大的差別。上述的例子顯示當價格差異和供應量短缺達到某一程度，廣州居民是願意暫時改變口味的。所以筆者認為，作者必須仔細分析各種國產米穀和洋米的品質、口味和價格的差異如何影響了廣州居民對米穀的取捨。

現時仍欠缺深入的研究，說明廣東省內其他地區的米穀的流動情況。在廣州起卸的洋米，究竟有多少是留在廣州城內？而又有多少流進了廣州周邊的富裕城鎮？作者引用的資料顯示廣州周邊的東莞、順德、南海、番禺和新會等地對米穀的需求很大（頁25），這需要分析廣州及其周邊城鎮各自消耗的進口洋米的數量，我們才能有廣州食米文化的確切圖像。作者的廣州洋米進口統計（頁118，圖6）和全國進口洋米數量統計（頁117，圖4）顯示從1920年代開始，當全國洋米進口數量大增之時，廣州洋米進口量卻有下跌的趨勢。1920年代中國大量採購洋米是農村經濟衰退的一個現象，這是由於廣州周邊地區因為農村經濟衰退而減少食用洋米，還是廣州居民因經濟不景而減少食用洋米？但無論我們如何理解廣州洋米進口數量的減少，顯然廣州人追求優質米的文化是受到經濟因素所左右的。

米穀供應減少往往是米商向政府施壓及囤積居奇以謀利的好時機。1936年廣州白米短缺令米商成功逼使政府減少進口洋米稅項，因而當年的米荒究竟有多大程度是米商的反擊，是一個關鍵的問題。其次，此米荒有多大程度是由外部因素引起，例如糖業的興起導致原來用作種植稻米的農田被改為蔗田，作者並未加以考慮。可見作者對於1936年米荒出現的原因及具體情況欠缺深入的分析。作者一再強調廣州人是不喜好湖南米和蕪湖米的，但是自1920年代開始，廣州洋米進口量下跌的趨勢，正好反映了進入廣州市場的國產米有所增加。究竟在1930年代，廣州每年進口多少洋米與國產米？作者並沒有提供最基本的統計，這不禁令人有點失望。

黃永豪

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

陳民鎮，《中華文明起源研究——虞朝、良渚文化考論》，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10年，337頁。

近幾年，中華文明起源成為學界關注的課題，這當然與「夏商周斷代工程」的結束及「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開展有密不可分的關係。研究中華文明的起源旨在尋根，以圖找出歷史的起點。《中華文明起源研究——虞朝、良渚文化考論》一書的作者陳民鎮即試圖打破我們固有的信念，指出夏朝以前還有虞朝，並以考古類型中的良渚文化為代表，以此說明中華文明的起源。著名考古學家蘇秉琦將中國的考古學文化劃分六大類型，其中的「環大湖為中心的東南部」區系即良渚文化之所在地。「良渚」一名最早見於南宋咸淳《臨安志》，作「梁渚」，至清代各版本《杭州府志》中，始有「良渚」一名。

全書共分七章，我們可大約再把書分為三部份，首兩章均為介紹良渚文化及何謂中華文明，第三章至第五章都是論證良渚文化與虞朝的關係，最後兩章則是闡釋傳說時代各部族的關係及其發展。

作者在「自序」中坦言全書的觀點在陳剩勇及呂琪昌所提出「夏文化源自良渚文化」這一觀點的基礎上形成（陳剩勇，《中國第一王朝的崛起：中華文明和國家起源之謎破譯》，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4；呂琪昌，《青銅爵、斝的秘密：從史前陶鬶到夏商文化起源並斷代問題研究》，杭